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經濟學（第一輯）

Die haugtheoriender volleswirtschaftslehre
經濟學說史

〔奧〕斯班（O. Spann）著 區克宣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经济学（第一辑）

Die haugtheoriender volleswirtschaftslehre

经济学说史

〔奥〕斯班（O. Spann）著 区克宣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说史/ (奥) 斯班 (Spann, O.) 著; 区克宣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47-0

I. ①经… II. ①斯…②区… III. ①经济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511号

经济学说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24.1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47-0/F.343

定价: 110.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端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第一版序

我現在把這本著述貢獻給研究政治經濟學的讀者和受過一般教育的讀者，其中所述的不單是一個經濟科學的歷史，並且同時簡明地敘述和批評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和一些主要的學說。我的目的，是要從歷史進化的變動着眼，討論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這種討論是越明瞭越簡明越好的；同時也想把這門科學現代的各種學說，給與一個最好的摘要。

在哲學的研究中，我們總以為這種方法是對於研究哲學學說較為了解之最容易的途徑。我們相信在經濟學中，這種方法也該是最簡易而最自然的路徑，因為在經濟學中如在哲學中一樣，我們往往要對於那極其複雜而困難的一連串的推論下一個判斷。還有一些情形，我們須得讓那研究名家自己說明的。我希望我這一點的努力或者可以滿足研究各種經濟學說的一天一天增加的需要，並且我也相信因為我這件工作之繁雜性質，一切的批評都是歡迎的。

斯班 (Othmar Spann)

第五版序文撮要

由於出版者的好意幫忙，結果把我這本書增大篇幅出版成爲可能的事情了……

我回憶到最初對於那學者指出社會科學的正常方法是怎樣的困難，披露這些學問的真精神是怎樣的困難，並且在差不多經過十年之久當我思索着我這書本在新的形式發現的時候，我不單是覺得這種著述工作是有缺憾的，即在現在也都覺得如此。誠然，由純粹歷史方面看來，這種工作是比较容易。因爲這一方面的工作，我的目的只是把近代經濟學的內容和以前經濟學的內容聯在一起，因而指出兩個時代的思想。所以這樣的書要紀載一切重要的智識是很容易的。但是我所需要的是有些不同，是超乎上述的需要之上的。我須給與讀者對於這些事物的根本性質的一種深切的理解，使他們認識經濟學與社會的真實關係。無疑地，很多專門的經濟學者仍相信僅由講學的方法，即可把我們這門科學的真理傳授於人，可是，政治經濟學是十分不適宜於膚淺的講授的。例如亞當米勒（Adam Muller），李斯特（List），李加圖（Ricards），馬克思（Marx），盧梭（Rousseau），柏拉圖（Plato）等等這些學者，對於社會的產生及其性質，不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觀念，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特殊見地嗎？說到這一點，我并不是想着

他們各個特殊的學說，（那不過是他們特殊觀念的說明），而是想着那活的與不可解的內在的觀念或表現，正如我們藏在腦中的以爲是一個可愛的人格，英雄的人物，歷史的時代的一個象徵。我很難希望這本書可以給與讀者這一類的東西。當最初研究經濟學的人是不能夠獲得這種根本的概念的。他們必須自己努力研究才可以發現出來。我這本書打算給與他們一個可靠的準備，使他們最先得着一線之光的。但是這裏須得使他們知道，這本書所給與他們種種可取的概念，只可以作爲他們研究的各種工具，他們應用這種工具時，其方法上應有一些改變的，並且需要一種特殊的重要性的，這應用方法上的改變與所需要的重要性，是依着他們對於重要理論的智識的深入而有不同，并且也依着他們自己的一般哲學之傾向於個人主義或普救主義而有不同。

正如一位生物學家，他的目的只是研究有生命的東西（這是缺乏無可指摘的客觀的特徵的），他所以研究有生命的東西，正因爲他自己是具有生命的動物，因之他自然懂得什麼是生命。所以經濟學的讀者必須由自己本人去發見和實驗什麼是經濟學和什麼是社會，而這些智識是與他一切的經驗、觀察、分析和研究有關的。

斯班（Othmar Spann），維也納（Vienna），一九一九年七月。

第十六版序

當十五年前我把這本書送到印刷店的時候，我並不想到我應用於經濟學說的範圍內的這種嘗試的新的度量標準，會這樣迅速地得着普遍的贊同的。當這個時候，關於亞當米勒（Adam Müller）這一位經濟學家，我所知的不過是他的一個名字而已，這是由於考察菲利普維亞（Philippovich），西摩勒爾（Stimmoller），瓦格勒（Adolf Wagner），康拉德（Conrad），布哈（Bücher），賈巴衛（Böhm-Bawerk）和柏瑟（Pesch）這些人的主要著述得來的，並且在一九〇七年由一個很濫巧的機會在一個舊書店裏購買一本幾乎被人們忘掉的 *Elements der Staatskunst*。同樣的，田能（Thünen）也被人們忽略和誤解了的；李斯特亦只被少數推崇，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德國在浪漫主義（Romanticism）時期之後，已經有了一種有「組織的」經濟學的體系的。這種事實是由於那早已傾向於實驗哲學的西摩勒爾派（Schmollerian School）的擁護者，已經忘掉他們的理論是由於浪漫主義和後期康德的德國的唯心主義（Post-Kantian German idealism）所產生的。

現在以浪漫主義為這一方面的基礎所佔着的重要的地位，已一天一天的被一般人認識了。

人們已不能再否認由亞當米勒一直到新的歷史學派的經濟學說都是由一條「紅帶」(Red thie ad)貫穿着的。亞當米勒，斐希特(Fichte)已對爾(Bader)，斯泰因(Baron von Stein) 李斯特，羅瑟(Roscher)，喜爾得布藍(Hildebrand)，克尼斯(Knies)，本哈得(Bernhardi)，西摩勒爾(Schmoller)，并且一直到哈萊爾(Carlyle)，納斯欵(Rushin)和揆立(Carey)等等的名字都是一脈相傳的。這些人所產生的有組織的普救主義(Uiversalist-organic)和唯心主義(Idealist)的學說，與亞丹斯密，李加圖，依舍(Say)，羅氏(Rau)，孟革(Menger)，澤豐滋(Jevons)等等所主張之原子論的個人主義(Atomist-individualist)和唯物主義(Materialistic)的學說可以互相輝映的。然而在這本著述中，我最先至少是要間接地指出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個人主義與普救主義的觀念之間的兩種學說的對照。

在這本書內，當討論公平價格(Just Price)的問題的時候，對於中古時代的經濟理論也給與一種新的見解，并且我們知道公平價格的學說是一種真正普救主義的學說。

可是對於我這本書毀譽都是有的。有些人以我重新提醒浪漫主義指摘我，有些人則以我對於「科學的詩意化」批評我。專就那些對我自己的見地而發的各種批評而說，我在書中已指出他們是無的放矢的。至於他們反對以浪漫主義為經濟學之有機學派的基礎這一點看來，我却要

中說浪漫主義不只是一種藝術的運動，且因為牠的廣汎的哲學上的聯繫，而是產生生活與文化的過程之一切抽象科學的運動，尤其是在社會和政治科學中顯示了由那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之第一個區分歐洲文化的運動。且更有進者，雖則牠是抽象的，我必須說這種趨勢却有十分功效和具體的實體，以決定五六十年間之實際政策的路徑。即在今日，以爲是產生一切保守團體之母的浪漫主義，如果我們只是注意於他們意識中所起的作用，其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比之我們所知道的遠較爲有力量的。這種種批評的一般態度，使我回憶關於約瑟第二（Joseph II）的一個故事。當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第一次出現於維也納的時候，國王向作者說：「我親愛的莫差特（Mozart）呀，若不是有這樣龐大的音號（Notes）在裏面，你的音樂就好樂了！」這些啓蒙者，唯理主義者，機械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不曾獲得生活上的基本音調，他們只聽見一個混雜的樂音。因之在中古時代的，浪漫主義的，普救主義的，種種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觀念中，他們不能認清有「這樣龐大的商號」以外的事實；并且像一個有「理性的人」，他們只能注意於他們所能記號和量度的外表及零碎之處。但是正如莫差特所回答的，他說：「一個音號不是多呀，先生！」所以我們把經濟學說和生活與社會的基礎現象聯在一起也不爲過分的。這個方法是與具體科學的實在性和邏輯的抽象思想的嚴密性都是符合的。一個低些的立場

是包括在較高些的立場之內。

在這一版中，下述的各部分都重新修改過：約翰·羅（John Law）的信用說；馬爾薩斯（Malthus）的收穫遞減律；李加圖（Ricardo）的地租說；坦能（Thünen）地方局限說；動力抑是經濟的法則（社會改良）；邊際效用說；現代的政治經濟學。此外，全書都審計過，而附錄中的「怎樣研究經濟學」，參考的書目，及一切的指示，都通通校訂過使合於新時代的精神。

斯班（Othmar Spann）

在附近於 Vorderberg 之 Styria 的 Der Lahn 地方。

一九二六年的耶穌復活節。

譯者序

經濟學正如其他的科學，是由於人類之實際要求而產生的。人們對於社會的經濟行為，在社會的生活方面認為有研究之必要的時候，經濟學始含有科學的性質，經濟學便是人們對於社會的經濟行為觀察，因而發見牠必然的法則而以理論表現其形態的一種科學。那末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經濟行為，可是人類的經濟行為是不斷地依着社會的進化而變動，所以經濟學也便隨着變動，因之經濟學也就依着時代的不同而產生許多不同的學說和派別，這便是經濟學的歷史性。

在自給自足的採集經濟階段以至於都市經濟的階段的時期當中，人類的經濟生活非常的簡單，人類的經濟行為實無視為一種獨立的科學而研究的必要。只能把經濟學所討論的事件附屬於法律學、政治學、倫理學、和宗教學等等的範圍研究，所以這個時期的經濟思想都是一些片斷的經濟思想。如像古代巴比倫人的利子觀念，腓尼基人的滙票的考究，他如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諸人，早已將生產、分配、交換種種概念，以及價值、勞動、分工、貨幣等等的概念多所論列的。可是經濟行為成為獨立的科學而發達的則是在比較的近代的時期。